

汪林茂 编著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

重庆出版社



汪林茂 编著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

重庆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 飞 彭 欣
封面设计 徐赞兴
技术设计 刘黎东

汪林茂 编著

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里程碑

ZHONGGUO ZOUXIANG JINDAIHUA DE LICHENGBEI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印制第一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5.5 插页 5 字数 637 千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

ISBN 7-5366-3764-O/K·195

定价:34.00 元

内 容 简 介

近代化是 17 世纪开始于西欧的世界性历史潮流,当中国在 1840 年被撞开大门之后,便融汇于这股潮流中,开始了一个曲折而艰辛的社会变革过程。如同在行进道路上需要里程碑作为进程的标志,这一动态演进过程离不开一件件事实作为其进程的标志和象征,而这些事实不少却鲜为人知。

由此,本书从政治、社会生活、军事、外交、经济、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八个方面汇集了标志中国进入近代的里程碑事件,共计 360 条,客观地描述近代前期中国这些领域近代化的开端,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全貌。该书采用条目式描述意味各个领域近代化的事件,极具丰富的知识性、史料性和可读性,对于人们认识 and 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有深刻的启示和帮助。

中国近代化纵横观

(代前言)

(一)

中国的现代化,从历史到现状、从理论到实践,都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且在近年形成了一股研究热潮。笔者编撰此书,也是受了这股热潮的推动。只是本书采取了与众多宏论巨著不同的编撰方式:在内容上,本书只截取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近代前期(1840~1919年)这一段。因为在我看来,在整个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两头——今天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和近代前期(即起步阶段)的现代化历史最值得重视和研究。今天已在宽广大道上奔驰的现代化大业,已有我们许多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家们在研究,而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的我,则想将这一段充满曲折、艰辛,“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作一客观描述。由此,我没有采用时下已经通用的“现代化”或“早期现代化”一词,而是沿用旧的“近代化”来作书名。因为:我更关注的是近代前期的中国现代化这段社会变革的过程,重在探索和描述代表资本主义时代的新事物、新思想学说等在传统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历史。同时也为了和我所截取的这段历史的内容相符合,避免因“现代化”一词(在过程意义上)的含义过于宽泛而造成误解。起书名的目的是为了与书中的内容相符,让人一看即知。至于理论上的

不同见解,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求同存异”了;在书的体例上,我采用的是在一定的体系统率下的条目式写法。这一者是为了更适合各个层次的读者,但更重要的想法是,我认为“现代化”(modernization)指的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它虽不是各种“现代的东西”(modernity)的简单相加,但就像作为一个客观演进过程绝对离不开这先后产生的一件件“现代的东西”——诸如现代思想(modernism)、现代交通工具(modernmean - sofcommunication)、现代化设施(modern convenience)、现代化武器(modernweapons)等等的量的积累一样,作为对这一客观过程的描述,同样也绝对离不开这一件件“现代的东西”(modernity)作为其进程的标志和象征——如同在行进道路上需要里程碑作为进程的标志一样。因此,我选择这种条目式的写法,以求尽可能客观地描述近代前期中国的各个领域的近代化的内容,尽可能全面地展现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现今人们常提到的)“现代性”的客观表现;本书所叙述的对象,仅限于各个领域走向近代化过程中位居“第一”的人、事物、思想学说等。因为,正如“第一部刑法典”标志着近代法律体系开始在中国建立、“第一个外交机构”标志着近代外交制度开始在中国产生、“第一部制定化学元素中文名称的译著”标志着近代化学科学在中国起步一样,“第一”正意味着该领域中“现代性”的“产生”、“起步”、“建立”,意味着该领域近代化的“开端”、“开始”。而且,任何事物,它的诞生、起步、开端是最有意义的,正如当年蒸汽机车的出现远比现在列车发展至电力机车更值得人们纪念和称道,今天的“妇女能顶半边天”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当年太平天国给妇女以平等财产权开始的这个道理一样。同时,我所选的都是中国人手创或参与开创的“第一”。因为,外国人带到中国的“第一”(例如外国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家银行、创办的第一所学校之类)固然给中国社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只有中国人亲手创立或参与开创的“第一”,更能真正说明中国人已在这个领域向近代化迈步。

当然,任何一种写法和体例都有它的缺陷;但只要它有其一定的可取之处,作为作者,于愿已足。

(二)

近代化是 17 世纪开始于西欧的世界性的历史潮流。世界上任何民族、任何国家,无论是愿意或不愿意,都不能、也不可能自外于这股大潮流。当中国在 1840 年被撞开大门之后,这股大潮流便强行把中国拽入这股潮流中,迫使中国人跟着它走。中国由此开始了一个社会变革过程。

这一过程并不像西方国家近代化那样是从涓涓细流渐汇成滔滔江河,中国近代化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条颇为宽广的人工开掘的运河。这是因为,中国近代化并非中国社会自然演进的结果。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急迫的救国救民历史任务的促逼下,近代中国人被迫以最快的速度采借西方文明,试图借用西方现成的近代化成果,作为救国救民的工具。但这些工具总是无效,中国人只能迅速而不断地更换并择用新的工具。于是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面迅捷扩大,形成了类似于杜鹃尚未谢去,秋菊却已竞相开放,继而冬梅已经枝头结蕾的奇特场面。诸如世界地图、蒸汽机图、“巴厘满衙门”(议会)同出现于一书,培根学说与先进的机器设备同时引进,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与“君民共主”学说几乎同时登场,第一所小学与第一条铁路同时诞生,“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之类的口号同时蜂起,“开民智”口号与共和革命的枪声同时响起……,代表各领域、各层次、各阶段近代化的事物、思想学说,在短短的 80 年时间里蜂拥而上地挤上了中国历史舞台,轮回交叉地匆匆演示了一遍。形成了一幅多头并进、范围广泛的社会变革图景。由此,现代社会学家所罗列的现代化的表征,在中国近代这 80 年间即已渐次显现:

1. 工业化,即社会经济由农业为主转变到以工业为主。这是一个国家近代化的基本标志。1859年太平天国领袖洪仁玕提出了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也可以说是第一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纲领,是为中国向这个方向启动的标志。接着,19世纪60年代产生了近代军事工业,建成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这些不仅是近代机器工业在中国产生的标志,更重要的是,这批最早从西方移植来的近代经济植株,成为改造中国这片中世纪荒漠的第一片资本主义绿色。在这以后,这片绿色逐渐蔓延、扩展,从只造枪炮、轮船的军事工业,扩大到民用的纺织、粮食加工、造纸、火柴等轻工业和交通运输、通讯业,从官僚把持的官办工业演进至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又发展起内外商贸、金融业等等,渐渐形成了散布于全国的资本主义绿色植被,使荒漠不再是荒漠。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倾向的出现:近代技术和机器渐次取代手工劳动和手工工具,非生物性动力开始替代人力、畜力作为生产、运输和通讯的基础,近代工商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等。至20世纪初年,政府终于放弃了传统的重本抑末立场,先后推出了各种近代经济政策,如商法、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商标制度、会计制度等。同时负责工商经济管理的政府机构产生,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科学化不断完善,说明近代经济已开始成体制地向前发展,这就为整个社会的近代化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2. 知识结构的近代化。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当时中国人知识结构的真实反映。鸦片战争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偏狭、单一的传统知识结构的失败。一些明智的中国人很快就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鸦片战争前后,林则徐、魏源便分别从实践上、理论上发起了中国人知识结构更新的过程。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鸦片战争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纷纷探求世界地理、历史知识(如《海国图志》、《瀛

环志略》等),西方枪炮、轮船知识(如《演炮图说辑要》、《火轮船图说》等)为开端,中国人对近代知识的探求呈现出两个趋向:从研究西方枪炮、轮船,指向近代自然科学体系;从研究世界地理、历史,指向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学说。而且,这两大系统的知识不断地扩大、加深——在自然科学领域,从枪炮制造技术,扩及声、光、化、电之学,进而涉及西方现代数学、物理等学科;社会科学领域,从考察西洋各国的“情状”,扩及到近代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哲学、美学等学科,从而使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了革命性的转换。这一转换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它推动了经济领域的工业化、军队的近代化以及政治领域的变革潮流,观念领域的弃旧向新。可以说,知识结构的革新,是推动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动力。

3. 政治领域的近代化。政治领域近代化的主要表现是:民主化和人民政治参与的扩大、行政管理机构的科层化、法治取代“人治”等。这些也是近代化的主要内涵。鸦片战争前后,处于专制政治之下的一些中国人,以其特有的政治敏感,觉察到另一个世界的不同政治制度——林则徐组织编译、1841年刊印的《四洲志》就特意向中国人介绍了“巴厘满衙门”(议会)。继起的一些中国人则对这个以“巴厘满衙门”为主要象征的民主政治制度由理解、赞赏直至主张实行之。至19世纪90年代后,政治领域的近代化更呈现出较全面开展的状态——甲午战后,民众开始以主动的角色参与政治。从集会、请愿、组织政团及政党直至参选和竞选、口诛笔伐甚至以暴力对抗专制政治等,中国人表现出从未曾有过的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态度;政治制度也开始了革新的过程,从设谘议局、资政院、实行地方自治、立宪法、三权分立,直至建立民主共和制度,召开正式国会,展示出全新的政治面貌;同时行政管理机构也开始变革。从戊戌变法中建立专门的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到20世纪初年成立明确分科、分层负责的11部,至民国政府实行近代文官制度,行政机构初步实现科层化;20世纪初年还开始了大规模

的法制建设工作,刑法、民法、诉讼法、商法、国籍法及一系列新的行政法规相继问世,继而法院成立,司法开始独立,律师出现于法庭上,出现了法治取代“人治”的势头。近代化的政治局面开始在中国出现。

4. 文化的世俗化。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文化的世俗化不仅是相对于“圣化”而“超圣入凡”的过程,也是相对于贵族化而平民化的过程。就前一个主要涉及文化内容的过程说,随着知识结构的更新(如:世界地理知识、哥白尼日心说、牛顿力学定律、培根科学思想、赖尔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卢梭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等),中国人开始以日渐觉醒的姿态,以“冲决网罗”的气魄,挣脱“天”、“神”、“圣经贤传”、死了的“圣人”、活着的“圣君”的束缚,本着理性精神、世俗态度和实效观点去看待万事万物和社会。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一个个划破中世纪黑暗的新思想主张冲天而出:“以商为本”、“君末民本”、“自由为本”、“天欲人理”、“政者民之事”、“人有自主之权”、“天地生人,本来平等”、“科学与人权并重”,等等。所有那些死了的、活着的“圣”、“神”、皇帝,过去的经典、现在的“圣旨”的“圣”化的地位被从根本上撼动,中国人开始努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

就后一个更多是涉及文化形式的过程说,文化开始走出封建贵族的圈子,日渐靠近民众。一方面,旧的即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学、艺术等文化形式在朝着世俗化的方向革新。如:撰述历史要以“国民发达”为主体,语言文字旨在使农工商贾、妇女稚儿也“一目了然”,诗歌、小说朝着“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努力,戏曲要做民众的“大教师”等;另一方面,又本着世俗化的宗旨,从西方引进新的近代文化形式。如:以民众教育为目的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被今人称为“大众传媒”的报纸、杂志,面向大众的话剧、电影,以“鼓民力”为宗旨的体育活动,为“众人”而不为“寡人”的西洋音乐、西洋油画、漫画等。实际上,它们不仅是从形式上,也从内容上

体现了世俗化的方向。

文化的世俗化,既是中国近代化的一大内容和标志,也是中国近代化的内在动力。

5. 城市化。城市化作为中国近代化的重要标志,它至少包含这3个内容:社会经济由农业型转变为工业型;人口集中,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社会生活向都市状态转变。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3个内容在中国近代都有一定程度的表现。从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开始,许多城市的经济逐渐以第二产业(工商经济)、第三产业(服务业经济)为主,第一产业(农、牧、渔等天然生产业)则相对减少,成为以工商业为主导型的城市。这在一些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如上海、南通)表现得更为突出;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原来的农业人口大量地转变为从事工商业和其它行业的城市居民,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城市劳动者有比较细的专业分工,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城市中聚集了各种社团,以及工商、金融、科学、文化、教育、新闻等机构,城市已成为经济、文化、科学、教育、信息和服务的中心。由张謇创办企业而兴起的南通可为典型。它不仅集中了一批工商企业,而且还拥有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南通师范学校等教育机构,还有科研、金融、新闻机构;由此,近代城市管理制度也开始产生。许多城市开始制定城市交通、卫生、市政管理等法规,建立了城市治安、卫生、消防等方面的管理机构;更重要的是城市化带动了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仅从书中所列的个案中即可看出,由于城市居民的生活活动条件和观念的改变,人们的衣着、饮食、交通条件等开始“西化”。穿西装、吃西餐、住西式住宅、在大马路上骑自行车、坐汽车等,这些“西化”的表现不仅仅是人们的趋新心理所致,更是为了适应近代社会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节律而作的生活风格的革新。同时,家庭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出现就是例证),社会协作和交往关系扩大(如大众传媒的发达、各类社团和机构的产生、公众

活动的增多等),人们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这不仅表现在衣、食、住、行条件的改善上,也表现在公园、自来水、电灯、医院、学校、消防队等新事物的出现上)。总之,人们的生活方式开始从落后、愚昧、闭塞、腐朽,转变为文明、科学、开放、健康。

城市化是社会迈向近代化的综合反映,是与近代化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工业化、知识结构更新、政治民主化、文化世俗化、城市化等,这一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图景虽谈不上壮阔雄伟,但也称得上是全面进步。

(三)

让我们再换一个角度,把中国近代化作为一个纵向的过程来观察。

早在鸦片战争前的二、三百年间,近代因素即已在中国传统社会内部孕育;但历史老人不耐烦中国以这种慢吞吞的速度按部就班地走到近代化。它让英国人以残酷的暴力打断了中国走向近代化的自然演进过程,且以明显优势的武力——“坚船利炮”,向中国人发出了民族生死存亡的威胁。在自身传统中不能找到有效抗击这种威胁的武器的情况下,中国人被迫从对手即西方人那里采借现成的近代文明成果来防御外敌和挽救自己。

中国正是以这样的被动姿态,在鸦片战争后从军事领域开启了近代化历程。从1840年郑复光编著《火轮船图说》、1841年丁拱辰著《演炮图说辑要》、1842年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口号,主张建立制造枪炮轮船的工厂为开端,士大夫们不自觉地承担起了“开风气之先”的历史使命,揭开了近代化运动的序幕,并开始

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完全“防御型”的近代化阶段,即:士大夫们只是根据直觉,出于防御和自救的目的,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19世纪60年代初以后,学习和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活动从理论转入实践,出现了一个建立兵器工厂和实施西法练兵的热潮。期间,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建成,并生产出后膛枪、后装炮、兵舰等;洋枪营、洋炮队、练新军等组建并投入使用,改变了中国军事领域的面貌,更给中国社会引进了许多经济的、科学的、文化的近代性事物和观念。也正是这些近代性事物和观念,成为中国社会向近代化变异的因素。从社会近代化的角度说,这正是第一阶段近代化的最重要成果。

第一阶段近代化运动完全是不自觉的。从观念形态说,可概括为“口服心不服”、“手动心不动”,即价值判断观念体系基本未变。这种状况在第二阶段(19世纪70年代后)开始有了改变。在前一阶段引进的近代性因素的作用下,中国的社会经济、科学和思想领域开始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开始大量翻译西方科学著作;1872年京师同文馆拟定并实施以外语为主,兼习自然科学、政治法律、经济、外交等科目的课程计划;同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留学生。这些说明,西方科学已进入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且渗入中国人的思想观念。1873年后,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以“求富”为目标的企业建成并营业;同一时期,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等私人开办的企业开业;1874年,王韬提出了重商主义理论。这些说明,中国人开始挣脱“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的传统教条束缚。1873年,同治皇帝首次以平等礼接受外国使节递交国书;1877年,清政府向外国派出常驻使节,意味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念起了重大变化。因此在这一阶段里,一方面是传统的价值判断观念体系出现了裂缝,另一方面是新的价值观念在萌生。中国人对西方的“现代性”的认识已不片面,无论是“兴西学”活动还是“求富”活动,都有一定的理性为基础。由此,中国人开始从不

自觉进至初步的有意识的近代化运动。

理性的初步觉醒,对西方“现代性”认识的深化,它所带来的必然是对西方文明的更深层次的思索和探讨,对传统文明更深层次的批判和扬弃。1882年后,上海知识分子钟天纬陆续撰成的《西学古今辨》、《格致之学中西异同论》等文章中所作的中西文化比较,正是这种更深层次探讨、思索的开端,也使中国近代化进入新的阶段。但真正为第三阶段近代化——人文主义思潮兴起阶段树起大旗的是康有为。他于1886年著《康子内外篇》,在前一阶段“求民生之本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天欲人理”这一人性论命题;1892年著成的《实理公法全书》,则是在“求格致之学”的基础上,以西方实证科学方法论证了“人有自主之权”的命题。这两大命题是对“人”及其价值的明确肯定,是中国人走向觉醒的显著标志。

康有为从理论上树起了资产阶级人文主义大旗,而更多的人则从实践的角度为实现人的理性本质,追求人的解放而努力。从本书中可以看到,旨在消除愚昧,普及文化教育的“切音文字”、语言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等主张,以及体现人的尊严和平等的礼仪改革“易西服”、妇女“不缠足”等要求,都产生于这一时期。其意义不仅仅是文化革新、社会改革,更反映了中国人的人性苏醒。

但没等到这个人文主义潮流走向成熟和壮大,民族危机却口断了它的发展过程。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许多中国人意识到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首先必须改革不能满足挽救民族危亡之需要的传统政治制度。这就迫使中国人提前跃进至近代化的第四阶段——政治变革运动阶段。1894年、1895年发生的这3件大事:孙中山成立兴中会、康有为组织公车上书发起变法运动、袁世凯小站练兵,正是这个阶段的开端。在这个阶段里,以公车上书、准许民间布衣百姓上书言事为标志,说明民众(这一时期主要是以士人阶层为主导)开始主动参与国家政治;兴中会、强学会等团体的成

立,说明新型的政治结社已经出现;兴中会武装起义的筹划、维新派上书请愿活动的进行以及对变法活动的积极参与,说明新的政治活动的开展;“合众国”、“开国会”主张的提出,说明新的政治目标已经确立;农工商总局的建立,是政治机构改革的开始。

这一政治变革运动毕竟是一次不成熟的运动,因此不久便归于失败,政治近代化运动受挫;然而,自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文化革新潜流则仍在扎扎实实、静悄悄地在中国社会进行着。在新闻出版领域,新型出版事业诞生,各种专业报刊并起;教育领域,大学、普通中学创办,师范教育、女子教育兴起,科举制度试行改革;文学领域,近代小说、散文、诗歌从传统文学中脱颖而出;社会科学领域初具雏型,近代哲学、社会学、语言学、图书馆学、历史学等纷纷问世;思想领域的变动更是激烈,“人人各得自由”、“冲决伦常网罗”口号,社会契约论、唯物论、进化论思想,在思想领域掀起了空前未有的波澜。正是这个扎扎实实、持续进行的文化革新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继续发展,才使得中国近代化运动不因慈禧之流的反扑而中断,更为即将到来的近代化运动高潮作好了准备。

《辛丑条约》签订前后更加深刻的民族危机,又逼迫中国人跃上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五阶段。这个阶段可以说是中国人自觉、全面开展近代化运动的阶段——对推进国家各方面近代化的必要认识,已不只是某几个精英分子、或某一群体中国人的认识,而是上自皇宫里的最高统治者,下至基层社会为数不少的平民百姓的共识,从而实现了投入近代化运动的各阶层总动员;近代化运动已不局限于某一、两个领域,而是全面推进:在政治领域,不仅政治活动在更具规模、更高层次上进一步发展(如君主立宪与共和革命的进行,近代政党诞生),而且新的国家政治体制已初露端倪(如司法开始独立,三权分立制度初建,宪法颁布,责任内阁制度制订),民众的政治参与面有相当的扩大(如结社、集会、游行得到一定程度的

允许并且开始出现,选举活动在全国开展,谘议局、资政院成立并开始起作用,地方自治制度颁行),国家开始走上法治化轨道(如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制度颁行,律师制度产生),1906年厘定官制,建立各有专职的行政机构,则是朝着政治机构的科层化迈出了第一步;经济领域中最突出的是近代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的产生。如《奖励华商公司章程》的制定,工商企业注册登记制度和商标制度的实施,对工商业活动给以法律保护和法律规范的《商律》颁行,成立国家银行并颁布银行法规等。其次是私人投资无论在投资的面、量和质上都有突破。最显著的例子是私营铁路公司、轮船公司、银行等企业出现,农业、林业、牧业、渔业等领域出现了民族资本经营的公司,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显著发展;军事近代化的成果也很突出,不仅开始大规模地编练新式陆军而且近代军事体制开始形成。如军队司令部和后勤、参谋部门的建立,中央政府中陆军部、海军部的设置,军官制度和军衔、军服、军队礼节制度的制定,军事学术活动的开展,等等;社会(主要是城市管理)日渐规范,如市政机构、地方自治机构越来越普遍地建立,城市卫生防疫组织、消防组织的建立,人口和户政管理制度的完善,开始从行政上明确划分城镇和乡村等;在思想文化领域,各种新学说(如狄德罗唯物主义,康德、黑格尔哲学,叔本华美学,穆勒逻辑学,卢梭、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边沁伦理学说等)的广泛介绍,为民主思想的勃兴推波助澜。“民主共和”、“道德革命”、“家庭革命”、“爱国主义”口号在知识青年中风行,报刊征婚、通讯订婚、晚婚、文明婚礼的提倡,以及对孔子等“先哲”的批判,说明思想观念的弃旧图新已成一股趋势;教育领域则明显地跃上了一个更高阶段。这不仅表现在这一时期新学堂大量出现,还表现在近代教育体制的建立(如癸卯学制的颁布和推行,教材的系列化等),表现在国民教育的兴起(如兴学重点已放在普通小学、中学,扫盲运动的开展等);文学艺术领域更是一片勃勃生机,许多新的文艺形式正是这

一时期被引入的,如五线谱、管弦乐、学堂乐歌、芭蕾舞、油画、漫画、电影、话剧、童话、大量的翻译小说等,这些都吸引了大量的中国人。旧的文艺形式也兴起了改革之风,出现了“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戏剧革命”、“改革古乐”等口号。而且,文艺被直接运用于为改良社会服务(如谴责小说),为革命服务(如南社文学活动)。的确,这十年(1902~1911年)间,中国近代化运动进入了高潮时期。

单就这一时期的近代化运动来说,成就不小;只是它没能使当时已更加深刻的民族危机、社会危机减轻些许,反而使中国人更加明白地认识到实现根本变革——近代化质变的必要。虽然,质变的条件远未成熟,但巨大的民族危机使中国人无法耐心等待。1911年的辛亥革命使共和国取代了君主专制,实现了近代化质变目标。同时也把中国近代化运动推进到第六阶段——制度层次的近代化运动,即中国人试图使近代化进入更高层次的定型化、体系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总体社会制度实现了(短暂的)近代化如南京临时政府和临时参议院的成立,《临时约法》颁布,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等;而且各个领域的近代化制度也相继出台。在政治领域,一系列保护人权的法令颁布,共和制政府机构的完善及文官制度的建立,政党纷起并开展竞选活动,试图实践政党政治等;在经济领域,进行了税制整理和改革,制定了近代货币制度和新的度量衡制度,颁布会计法、证券交易法等;教育领域中,颁布了第一个近代教育宗旨,实行教授治校制度、教衔制度,建立了学术评审机构;科学技术领域,科研机构开始进入政府部门(如气象科、地质研究所)。而且,以“中华工程师会”和“中国科学社”成立为标志,中国的科学技术体制初步形成,等等。

应该说,这一近代化质变——制度层次近代化阶段已经达到了它的“力”(即前几阶段近代化量变所积聚的能量)所能及的程度。如果说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是社会近代化的最高成果